

管
雄 / 著

魏晋南北朝文学史论

南京大学出版社

魏晉南北朝文學史論

魏晋南北朝文学史论

管 雄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魏晋南北朝文学史论

管 雄 著

*

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南京大学校内 邮政编码: 210093)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南京化工大学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5 字数: 230 千

1998 年 3 月第 1 版 199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7-305-03132-1/I • 260

定价: 15.00 元

目 次

魏晋南北朝文学序说·····	(1)
魏晋南北朝诗学述论·····	(10)
论魏晋民间文学·····	(63)
建安文学综论 ✓·····	(72)
论正始文学·····	(101)
论太康文学·····	(110)
论东晋文学·····	(124)
论陶渊明··✓·····	(133)
南北朝乐府民歌··✓·····	(146)
谢灵运及其山水诗··✓·····	(157)
论鲍照·····	(205)
简论谢朓与永明新体诗·····	(235)
论《文心雕龙·原道》·····	(241)
论北朝文学·····	(263)
魏晋南北朝小说·····	(288)
附录一 唐以前诸家《汉书》注考·····	(300)
附录二 如隐堂本《洛阳伽蓝记》校记·····	(336)

魏晋南北朝文学序说

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期(3—6世纪),除了和它以前的文学有继承的关系以外,还有它自己的独特面貌,而且在这一时期的不同阶段中,也还有其各自的特点。我们为了分析构成这种独特面貌的因素,首先应对这一时期的社会历史背景做一番总的考察。

一 社会环境

大汉帝国发展到桓、灵之际,由于统治阶级的残酷压榨人民和侵占土地的有增无减,又以水利不修,连年灾荒,导致广大农民大多破产,到处流亡,社会矛盾遂日趋深刻化和尖锐化。从安帝时起,农民暴动此起彼伏,不断发生。同时在东汉朝廷内部,外戚、宦官和官僚因争夺、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政治和经济特权,时时发生矛盾和冲突。从此,中国陷入长期的战乱之中。内而同室操戈,外而戎狄交侵。社会分崩,百姓涂炭,终于酿成战乱频仍的惨剧。从东汉黄巾起义(公元184年)以来,一方面埋葬了腐朽的东汉统治政权,另一方面也使社会陷入更深重的灾难中。《后汉书·皇甫嵩传》载:当时“百姓歌曰:‘天下大乱兮市为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东晋、宋、齐以及北魏各朝也都发生过农民起义。建安以来文学中的哀怨之声,正是从这“世积乱离”的时代中迸发出来的。

在统治阶级内部,军阀混战,豪强兼并。从东汉后期的董卓

之乱，到三国时期的魏、蜀、吴之争，大都市沦为瓦砾场，“生灵板荡、关洛荒芜”，正是当时景象的真实写照。西晋灭吴（公元280年），结束了三国分立的局面，但仅仅十余年就爆发了“八王之乱”。西晋统治阶级对于徙居塞内的西北各族一向歧视和压迫，使他们“怨恨之气，毒于骨髓”（江统《徙戎论》）。而统治阶级内部的腐化混战，也给西北各族进入中原以有利机会。“永嘉之乱”以后，北中国为西北各族所分割占据，建立起“五胡十六国”，使北中国长期陷入混乱的局面。在这样的浩劫下，长安、洛阳等文化中心频遭毁灭，人口锐减，城郭荒芜。东晋偏安江左以后，时时不忘恢复中原，百年之间（公元317—416年），祖逖、桓温、庾亮、谢玄等人曾先后进行了十三次北伐，尽管结果都归于失败，但每次北伐，都得到了北方汉族人民的欢迎和支持，这对于北中国人民坚持反对种族压迫的斗争，是起着维系的积极作用的。

西晋内乱导致的永嘉惨祸，形成了汉族与西北各族的南北对峙。北中国在西北各族的蹂躏和统治时期，社会经济遭受到严重的破坏与摧残。由于西北各族进入中原的时候，大多还没有脱离家长奴役制的阶段，他们还保留着游牧部落的生活习惯和强悍作风，以劫掠邻人的财富为他们的主要生活目的之一，因而各族间经常进行着混战、屠杀和掠夺，使许多地区的土地和城市都沦为丘墟，工商业因此也停滞了。后来北魏孝文帝（458年）虽然采取了“均田制”，希望恢复和发展生产，安定社会秩序，也采取了种种汉化政策以笼络汉人，以巩固自己的政权，但始终不能恢复中原旧有的盛况。与此同时，从公元四世纪到六世纪，即东晋南朝时代，南中国的经济，却获得了进一步的开发和发展。自西晋末年，西北各族进入内地，中原与关陇地区的人民与士族大量南迁，造成了南中国人口激增的现象。东晋初，北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流民又相率渡淮过江，这些渡江避难到南中国来的，大批是农民，他们带来了比较进步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把过去江南荒凉的地

区逐步建设成美丽的田园和村落。在南迁的流民中也有大量的知识分子，他们有远至福建、两广，南入交趾的，无形中对这些地区进行了文化传播。随着农业的发展，南中国的水利事业也逐渐发展起来，手工业、冶铁业、纺织业等都相当发达。由于海外贸易的发展，刺激了造船业的发达，如祖冲之发明千里船，用机器转动，日行百里。在这样的环境下，当时的建康不仅是政治中心，商业中心，也是文化中心。在这几个世纪中，中国文化的重心就由北方转移到南方。这也导致了南北文学发展的不平衡。

从用人制度的变迁来看，汉代实行的征辟制度，以儒家道德标准作为选拔人才的金科玉律。曹操则进行了重大改变，主张“唯才是举”，即所谓“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三国志·武帝纪》）。九品中正制度的施行，也正是为了适应这种“唯才是举”政策。沈约《宋书·恩幸传》指出：“汉末丧乱，魏武始基，军中仓卒，权立九品，盖以论人才优劣，非谓世族高卑。”然而自两晋以来，把东汉推举与征辟的察举制度与曹魏时代所创立的九品中正制度，发展成为保障贵族特权的士族制度，即沈约指出的“徒以凭藉世资，用相陵架”。如南朝定制，世家子弟二十岁便可登朝作官，而且外迁也极容易；卑族年过二十才得试作小吏。在婚姻上，门第相等，才得通婚。梁代侯景曾胁迫萧衍允许他求婚于王、谢二姓，萧云：“王、谢门高非偶，可于朱、张以下访之。”（《南史·侯景传》）可见门第等级的严格。士族与非士族的身份，有不可逾越的界限，甚至皇帝也不能改变它。士族的家谱，特别被人重视，他们的名籍藏在官府，一般人是无法冒充的。士族掌握着统治权，改朝换代，也不能改变他们的地位。这样，也就逐步形成了文学的贵族化。《宋书·谢灵运传论》讲到元康文学时，特别提出“辍旨星稠，繁文缙合。缀平台之逸响，采南皮之高韵”，当指贾谧门下二十四友的文学活动；至南齐时代的竟陵八友，他们的创作也体现了文学的贵族化倾向。而

梁、陈时代的宫体文学，思极闺闱，辞穷淫艳，被初唐评论家斥为“亡国之音”。陈代江总、孔范等被称为陈叔宝的“狎客”。这种形式华丽、内容空虚的贵族文学，正反映了统治阶级的没落。

二 玄学的兴起与新的人生观的确立

儒学在汉代盛极一时，尽管汉代的实际政治中采取了许多法家的策略，但在思想原则上，是独尊儒术的。到了东汉，随着统治阶级的一天天腐化，儒学也一天天神秘化、繁琐化，日益脱离了它辉映理想、照应现实人生的实际内涵。汉帝国所竭力宣扬的儒家王道，同汉末的腐朽政治和残酷现实形成鲜明的对照，儒学的信仰遂一步步动摇。到汉末黄巾起义以后，一般士人救死扶伤都不暇，根本没有功夫坐下来讲礼仪^①。同时，董卓之乱，也使中原的经济和文化遭到惨重的破坏和损失。因此，汉代盛行的章句之学，在客观上也没有条件恢复了。通经的人才逐渐减少，到太学来念书的，其目的并不在于学术，而是为了避役。甚至太学的博士，学问也很浅薄，以至于不能教育他的学生。魏曹芳时，朝廷大小官吏及太学生在京师的有万余人，能通古礼的屈指可数；中央官吏四百余人，能提笔作文的还不到十人（《三国志·王朗传》裴松之注引鱼豢《魏略·儒宗传序》），学术到了这种境地，也就不得不变了。

这个转变就是由儒学转变到玄学。《文心雕龙·论说篇》指出：“迄至正始，务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论。于是聘周当路，与尼父争途矣。”魏晋玄学是由道家思想发展而来，由于道家思想对人世黑暗和人生痛苦的激愤批判，以及对超越黑暗与痛苦的个体

^① 郑玄是汉末的一位经学家，他在《戒子益恩书》里说：“黄巾为害，萍浮南北，复归邦乡。……所好群书，率皆腐敝，不得于礼堂写定，传与后人。”（《后汉书·郑玄传》）别的人更可想见了。

自由的强烈追求，正符合于当时亲身经历、体验了儒家思想的虚幻、破灭的魏晋人的心理，因此玄学遂应运而生。魏晋玄学家提出了老、庄，当然不能简单地认为是先秦老、庄思想的再现，而是适应了当时社会现实的需要。他们谈玄有两种意义：一是重新发挥老子无为而治的主张，指导君王怎么样做一个最高统治者。这种主张随着门阀的发展与巩固，实质上是要削弱君权，放任世家大族享受其特权。其二是一些不得志的士人，以愤世嫉俗的心情提出“自然”，以反抗当局所提出的“名教”。这些人在思想上是积极地反抗现实，而在行动上却又消极地逃避现实。也有一些人表面上清谈玄理，提倡放达，实质上则是掩饰自己穷奢极欲的腐化没落生活。这对于文学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文心雕龙·时序篇》说：“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诗品序》也说：“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这些都说明了玄学的形成和发展对文学所起的影响。

魏晋玄学是魏晋人新的人生观的思想基础。东汉桓、灵之际，名士与宦官作斗争，但两次党锢之祸，尤其是第二次，株连最广，杀戮最多。天下大乱，名士遇害。到了魏晋，惨遭屠杀的名士就有祢衡、孔融、杨修、何晏、嵇康、张华、潘岳、陆机、陆云、刘琨、郭璞等。在这种形势下，汉末的“清议”逐步转变为魏晋的“清谈”。在人物品评中流露出一种新的人生观。《庄子》中的“神人”形象，阮籍《大人先生传》中的“大人先生”，都体现了魏晋人的理想人格。这与儒家理想中的圣君贤相的形象不同，恰好是儒家理想破灭后的产物。而魏晋人的人生观，恰好是其反动，追求一种自由旷达的生活，他们或讲清静无为，或讲逍遥自适，或提倡养生长寿，或追求纵欲淫佚，都具有反传统、求解放、排圣哲、非礼法的特征。在这段时期，作为最高的标准和原则，已不

是人的外在节操，而是人的内在精神。时人不拘礼法，遂与药和酒发生了密切的关系。而文学的个性化特征也在这一时期的创作中凸现出来。

三 佛教与道教思想的传播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阶级矛盾和种族冲突的剧烈斗争里，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陷入了无比的苦痛，这样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基础，给宗教思想的传播造成有利的环境。汉末初起的佛教和道教，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迅速的传播和发展。尤其是佛教，在思想上给人以很大的影响。

佛教得以传播，有赖于佛经的翻译。最开始仅是口译，鱼豢《魏略·西戎传》载：“昔汉哀帝元寿二年，博士弟子景庐（《魏书·释老志》作‘秦景宪’）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图经》。”因为是口授，所以翻译的名号多不统一。到两晋时，佛经翻译得到很大的发展，出现了像竺法护、释道安、鸠摩罗什等译经大师，不仅注意准确，而且注意雅洁。佛经的翻译遂形成了一种新的文体。

由于翻译佛经，传入了切韵，明确了四声，这对于中国的骈文和新体诗起了很大的作用。受佛教思想的影响，也就出现了如王齐之的《佛教三昧诗》、谢灵运的《净土咏》及萧衍的《净业赋》等作。另外，佛在进入涅槃之际，要召集弟子以示辞世之训，中国的佛教徒对此大加效仿，只不过不是临终辞世之训，而是自己人生观的真切表白。这就形成了六朝时期的临终诗。如苻朗的《临终诗》，首句便是“四大起何因，聚散无穷已”之句（“四大”，据《俱舍论》所说，乃地水火风，此四者广大，造就成一切物质）。这种临终诗的形式，后来在日本文学中也屡见不鲜。

佛经对六朝小说也产生了影响。佛教为了敷衍佛法，往往

“广取譬喻”，如《旧杂譬喻经》、《百喻经》等。其中的故事对小说的影响，不仅有思想上的因果报应，而且有故事情节上的影响。鲁迅说：“魏晋以来，渐绎释典。天竺故事，亦流传世间，文人喜其灵异，于是有意或无意中用之，遂蜕化为国有。”又说：“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中国小说史略》第五篇《六朝之鬼神志怪书》上）这已很明确地说明了佛教、道教思想的传播对六朝小说的影响。六朝以后，佛经故事又不断被采纳到变文、戏剧中。

四 文学艺术的发展和文学理论的建设

魏晋时代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文学的独立并不开始于魏晋，班固作《汉书·艺文志》专列“诗赋略”，就表明当时人已经认识到诗赋的特殊意义。但正面强调文学的独立价值，不作为实用的、而作为审美的价值，这是在魏晋之际。由人的自觉而引发出文的自觉。汉代的文学艺术以及汉人对文艺的认识，一以讽谏的实用性为指归，而魏晋玄学兴起以后，文艺则成为一种超实用的审美对象。超越的玄学思想落实到人生，便成为一种超越的生命情调，从而发散为一种超越的艺术性格。所以汉人论诗是“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谏。”（《诗大序》）而魏晋人说“诗缘情而绮靡”（陆机《文赋》）；汉人论绘画是“图画天地，品类群生。……恶以诫世，善以示后。”（王延寿《鲁灵光殿赋》）而魏晋人说“四体妍蚩，本无关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之中。”（顾恺之语，《世说新语·巧艺》）汉人论书法是“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扬雄《法言·吾子》）魏晋以下人则说“王羲之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古今书人优劣

评》)从这一简单的比较中,不难看出六朝文学思想的特色所在。

这一时期也是中国艺术史上成就极其辉煌的时代。东晋王羲之、北魏郑道昭的书法,千古独绝;顾恺之的维摩诘像、宗炳的山水画、张僧繇的壁画,也妙绝当时。他们不仅有创作,而且也有理论,如谢赫论绘画“六法”,乃成为中国画学上的金科玉律,为后代的艺术家指示了无限的法门。还有戴逵、戴颙父子的雕刻,创造新意,使众人信服。其它像洛阳伽蓝的建筑,云岗、龙门的石刻,都是艺术史上不可磨灭的丰碑,永远值得人们去追想瞻仰。

只有弄清这些重要的历史事实,对这时期的文学发展才能有进一步的理解。

诗歌的体裁由四言发展到五言,五言诗在这一时期大量涌现。东汉的应亨和班固,该是可考的最早使用五言体的诗人,但都很朴直,所谓“班固《咏史》,质木无文”(《诗品序》)。至建安时期,三曹、七子“以情纬文,以文被质。”(《宋书·谢灵运传论》)其特色是重“情”。所以陆机讲“诗缘情而绮靡”,正是反映了建安以下诗歌创作的倾向。五言诗发展到西晋,开始向俳偶繁缛发展,追求词采的华丽与对偶。到东晋,受玄学的影响,玄言诗兴起,其作品杂揉玄、道、佛言。同时,由玄学而引发出自然美的发现,田园山水文学也开始出现。到了晋、宋时代,便出现了陶渊明和谢灵运。由文、笔的区分引发了对文学特征的进一步把握,而声律论的探讨也更促使人们追求诗歌的音乐美。南齐永明体的出现,代表了中国诗歌由古体向近体的过渡。在谢朓的作品中,已有全篇类似唐人的诗歌了。宋、齐的诗人,还大量吸取了民间乐府的新鲜血液,尤其是鲍照和惠休,将杂言诗发展到汉代民间创作以来的最高成就,成为唐代李白等人的先驱。梁、陈以后,诗歌创作局限于宫廷的小圈子中,宫体诗和咏物诗,虽然不乏精工细腻之笔,但从总体来看,却呈现了一种病态的软弱无力的风格。对于这一诗风的变革,要等到“初唐四杰”出来以后,

诗歌才“从宫廷走到市井”，“从台阁移至江山与塞漠”（闻一多《四杰》）了。

辞赋在两汉，篇幅阔大，语词丰富，反映了大汉帝国统一的伟大规模与气象。而魏晋以下，军阀混战，人民生活动荡不安，生命缺乏保障，连大贵族石崇都发出了“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金谷诗序》）的哀音。像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那样制造大赋的条件消失了，因此抒情小赋便发展起来。而当小赋的数量和质量积累到一定阶段时，大赋又吸取了小赋的抒情笔调，从而出现了抒情大赋。庾信的《哀江南赋》等作正代表了六朝辞赋辉煌的结合。

小说在这一时期受了佛教、道教的影响，出现了大量的志怪小说；因玄谈盛行，又出现了如《世说新语》一类的志人小说。这些作品都开启了唐人小说的先河。

文学创作的高度成就，也促进了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从曹丕的《典论·论文》开始到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和钟嵘的《诗品》，不仅出现了专题单篇论文，而且还出现了批评专著，在我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开拓了一个新时期。

魏晋南北朝诗学述论

魏晋南北朝文学创作的高度成就，促进了文学理论批评的繁荣。这时期产生了我国历史上第一篇文学批评论文，也产生了第一部文学批评专著。文学批评具有了独立的本体价值，建构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曹丕的《典论·论文》就作家、文体、文学功能等方面问题提出了崭新的见解，在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陆机《文赋》对文学创作的思维过程进行了缜密的分析，对文学作品的特征作了更具有审美意义的界定，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还有如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李充的《翰林论》等，皆可见当时文体论之发达。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古代文论光辉灿烂的阶段，文学批评专著纷纷出现，其中刘勰《文心雕龙》与钟嵘《诗品》，或全面而系统地论述作家作品、文学风格、文学与时代、文学的本质、文学创作过程等问题，或专就五言诗探讨其起源流变、品第其高下优劣，更达到了我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的顶峰。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批评之所以能够彬彬其盛，蔚为大观，自有其文学内部和外部的深刻原因。

就其文学内部的原因而言，是因为在先秦两汉文学的发展基础上，魏晋以来的文学呈高度繁荣的局面。就文体而言，诸种文体大致齐备，除诗、赋以外，如颂、赞、铭、箴、碑、诔、哀、吊、论、连珠、章、奏、书、记等文体在实践中都大量运用；就时代而论，建安文学、正始文学、太康文学、元嘉文学、永明文学等贯穿整个魏晋南北朝；就诗体诗派而论，就有建安体、玄言诗、山

水诗、宫体诗等名称。就作家而论，涌现了三曹、七子、嵇康、阮籍、陆机、潘岳、张华、张协、左思、陶潜、谢灵运、谢朓、鲍照、颜延之、王融、任昉、沈约、庾信等诗人，皆各擅所长，称雄一时。文学创作渐渐摆脱汉儒政教观念的束缚，由功利性、实用性转向审美性，由铺排事功转向个人抒情，“诗缘情而绮靡”，文学作品已达到了较高的艺术境界。这一切，都要求批评家从理论上对之加以概括、总结和提升，从而刺激了理论研究的热情，形成了理论上的繁荣局面。

从文学的外部因素来说，魏晋以来的思想大解放促进了人们思辨力的发展，在儒家王道观念衰败之时，人们自然地吸收各种人文思潮来观察人生、解释人生，当然也包括用来解释文艺现象。玄学的兴起开启了文学审美情态的通路，接受老庄超功利的、逍遥自得的思想，在文学上的直接结果就是使作家与作品获得了一种艺术的精神与品位。佛教的传播与兴起，使人们对音韵声调有了更深切的体认，这不仅对骈文与新体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推动了文学声律论的发展。此外，魏晋南北朝时期帝王雅好文学，这对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的繁荣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自曹魏开始，“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文心雕龙·时序》）南朝帝王，爱好文学者甚多。“自宋武爱文，文帝彬雅，秉文之德；孝武多才，英采云构。”（同上）宋文帝时立四个学馆，于儒学、玄学、史学三馆外，还别立文学馆，宋明帝还亲自编撰《晋江左文章志》。齐高帝、武帝也雅爱篇章。梁代武帝、昭明太子、简文帝、元帝以及陈后主更是身体力行，倡导文学。帝王作为政治力量的代表而提倡文学，这就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使得一批文人才士萃集于他们周围，互相赠酬唱和，不仅推动创作的进行，其谈文论艺之活动，也直接促进了文学批评的发展。

因为有以上诸多因素的交互作用，遂使魏晋南北朝时期之文

学批评取得丰硕成果,在我国文学批评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一 曹丕的“诗赋欲丽”说

曹丕是邺下文人集团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的《典论·论文》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一篇重要的论文。它涉及到文学的价值、作家的个性与作品的风格问题以及文体和文学批评的态度等问题。

各类文章发展到曹魏时期,不仅各种文体粗具规模,而且各自的特征已经鲜明地凸现了出来。曹丕指出: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

(《典论·论文》)

文学的各种体裁的基本材料都是用文学语言营构而成的,各种文体都自有特点,这里提到的雅、理、实、丽,就是对各种文体特点的概括。

曹丕提出“诗赋欲丽”,这是他从《诗经》、《楚辞》以来下及汉魏乐府、文人的五言诗创作而总结出来的艺术特点。经他这一理论上的总结之后,又推动了当时的诗歌创作。曹氏父子以及建安七子的诗作都具有“丽”的特点,同班固《咏史》的“质木无文”迥然有别。尤其从被称为“建安之杰”(钟嵘《诗品序》)的曹植的诗作上,更容易看出这一特点。

“丽”是美好的意思。《楚辞·招魂》“被文服纁,丽而不奇些。”王逸注:“言美女被服绮绣,曳罗縠,其容靡丽,诚足奇怪也。”曹植在《薤露行》里说:“骋我径寸翰,流藻垂华芬。”就是说如果他不能建功立业,就得纵笔为文,把芬芳的文采流传到后代,以成不朽之名。这是他写诗赋要求华丽的目的。

汉代辞赋的艺术特点是“丽”。扬雄说:“诗人之赋丽以则,辞